

先生曾一玉天津正街奉謁到已席
 京懷甚得 吳君書示
 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玉慰 考試命題
 事極中而推前代正安 為國家中有
 人遂行此一句內頗煩擾不能用心
 於內學 謹乞

本校累久人極忠厚 正不才歲暮風波
 教士有學 先生之德也 固學之有賴也 根株
 二君中任此人有教於吾 尚望能 貴西奉復
 可貴 惟以日子不端或 孟君更長耳 此畏
 勢極難 不才亦 吳君派代表 尚望能 貴西奉復
 多行此 此致

中国文论的经典与文体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三十三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CI) 来源集刊

胡晓明 主编

中国文论的经典与文体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三十三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胡晓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论的经典与文体 / 胡晓明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0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 33 辑)

ISBN 978 - 7 - 5617 - 9043 - 4

I. ①中… II. ①胡… III. ①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703 号

中国文论的经典与文体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三辑

主 编 胡晓明
责任编辑 陈庆生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4.5
字 数 397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9043 - 4 / I · 830
定 价 40.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主 编 胡晓明

编辑部主任 彭国忠

编 委 (依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军 齐森华 兴膳宏[日本]

宇文所安[美国] 朱良志 朱杰人

朱晓海[台湾] 陈文新

陈国球[香港] 李建中

李春青 汪涌豪 许 结

肖 驰[新加坡] 张 晶

张 毅 张少康 张伯伟

张国庆 张隆溪[香港]

曹 旭 曹顺庆 黄 霖

蒋 凡 蒋 寅 蒋述卓

谭 帆

编辑部报告

中国古代文体论一个先要命题即是宗经,认为各种文体皆来自《五经》。《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本《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第三》继承了颜之推的观点,而在具体文体及其经典渊源上略有区别:“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并进而提出:“若稟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可以说,“稟经以制式”成为中国文体论一大恒常原则。所谓“式”,即文体,斯波六郎明言:“‘式’,即体式,指文章格式。即论、说、辞、序等文体形式。”《文心雕龙》从《明诗第六》到《书记第二十五》二十篇,讨论了几十种文体,皆以宗经为依据。当然,刘勰之本意,更为深刻:“彦和《文心》,力主宗经……不特说明各种文体皆导源于《五经》,且极力于经书中探索‘文’之意义,以立其建言之根据。”(饶宗颐《文心雕龙探原·刘勰文学见解之渊源》)故其《征圣》篇复云:“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而“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考其本心,“原道之要,在于征圣,征圣之要,在于宗经。不宗经,何由征圣?不征圣,何由原道?纬既应正,骚亦宜辨,正纬辨骚,宗经事也。舍经而言道,言圣、言纬,言骚,皆为无庸。然则《宗经》其枢纽之枢纽欤?”(叶长青《文心雕龙杂记·辨骚》)前此,王充《论衡·佚文》篇所言:

“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应该也包含更为具体的《五经》为各种文体准则的内涵在。

然而，刘勰论文宗经之范域，实不止限于此。《文心》第二十五篇文体论结束以后，大体仍以宗经为精神。举凡“《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风骨第二十八》）、“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通变第二十九》）、“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定势第三十》）、“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第三十一》）、“《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章句第三十四》）、“《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干》四德，则八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丽辞第三十五》）、“《诗》文弘奥，包韞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比兴第三十六》）、“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子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夸饰第三十七》）、“夫经典沈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杨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事类第三十八》）……亦即文学之手法、风格、章句、用字、辞采、用事，等等，皆以经典为式则，以圣贤著述为轨制。

此亦非刘勰一家之论，实乃中国历代论文家不变不革之绳墨。且愈到后来，愈是后出的文体，新异的式样，愈要宗经据典，依圣凭规，其意在为自己寻得一渊远之来历，觅取一合法之身份外，另有深至焉，实不容浅言庸议之。

经典、文体、形式，以上这三个方面，也就构成本辑的主要内容。由美国学者余宝琳撰写，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张万民、张栢楣翻译的《隐喻与中国诗》一文，在比较的视域中，考察了中国诗歌有无隐喻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在隐喻修辞手法之存在的重要歧异，“这些歧异，与其说在于修辞手法本身，不

如说在于修辞背后的写作传统和世界观、以及诗学的一些根本预设。”而实际上，“几乎所有中国诗的意象，都不是隐喻，因为隐喻中的比喻关系有精巧的设计，而中国诗的意象只是特定的语义范畴或是智力、情感意蕴的体现”；中国诗中只有转喻，“它并不指向另一个自足的、完全异于诗人和读者感官世界的超验领域，因为那个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也没有一套从无中创造有的模式”，这导致了中国诗歌缺乏比喻或替代的扩展模式。文章对当代一些著名汉学家的观点，也提出了异议。卢盛江先生《〈文镜秘府论〉的一些病犯研究》就人们关注的声病、八病之外的一些病犯，如忌讳、形迹、傍突、翻语，落节、杂乱、相反、文赘病，进行较为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剖陈其文化背景和创作心理，指出其合理价值，也对其束缚创作力和想象力提出批评。

张勇《论偈与诗的界限》，讨论中国诗人中较为独特的一个群体——诗僧所作诗歌的辨别问题，即：何为诗，何为偈？文章认为偈与诗是两种形式相近而实质不同的文体，皆出以整齐的句式，讲究对仗、韵律；其主要区别有四：主旨上的“为法作”与“为诗作”之别，内容上的有情与无情之别，结构上的意象与概念之别，语言上的禅语与禅趣之别。这个看法对偈与诗的界限，整理、补遗僧诗，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张培阳《折腰体新探》认为“折腰体”一名虽然首见于唐代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其中选崔峒诗《清江曲内一绝》，题下注“折腰体”，但是何谓折腰体，集内并无说明；今人或者将其释为“失粘”、“不粘”，或者别出新意，以为“是作者选择了某种平仄格律以后，并不按这种格律写下去，而是在诗的腰部改按另一种格律来写”；对折腰体的真正含义，其实在古代一直不乏正确的认识，它的准确解释，应该是宋代惠洪等人所说的“虽中失粘而意不断也”，而且尤重在“中失粘”三个字。文章对“折”、“腰”、“体”三个关键词进行具体考证，得出结论：首先，它有一处失粘，而且只能有一处。其次，失粘的位置应位于一首诗的中间，即绝句的二、三句，律诗的四、五句或二、三联之间的位置上。单重阳《从七古到七律：清前中期的山谷诗接受小史》对宋诗代表作家黄庭坚诗歌在清前中期的接受史，从体裁分明进行梳理，认

为清初宋诗风兴起之时,诗坛关注的主要是黄氏七言古诗,七言律诗则被认为不值得取法;乾嘉时期,黄氏七律开始进入诗家的视野,姚鼐与翁方纲是其中的代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既有时代环境的要求,也因为七言古诗与七言古律的传统不同,还与唐宋诗之争的大背景有关。张思齐《在比较的视域中论明代八股文的哲性基础》,从较为宏通的视域,考察了明代政治、科举制度、文学批评、八股文的创作之间的关系。

“经与思”栏目,我们刊发了四篇文章。刘顺《〈五经正义〉诗学思想简论》,认为孔颖达《五经正义》含有丰富的诗学思想,而出新意于贞观史学家之外,其“诗缘情”、以“象”为体、兴必取“象”、三体三用与三用重“赋”等论诗之说,于唐文学影响甚巨。程刚《苏轼易学中的“和而不同”与其文艺思想》一文,认为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于《同人》、《睽》等卦的阐释,表达了他对于同异关系、个性与共性关系的认识,即“以有所不同为同”的“和而不同”;苏轼借这种尊重个性、包容差异性的思想,在他的文艺思想中也有所表现。查洪德《论元人文论的“文与道一”说》指出“文与道一”说是元代文论家的重要理论贡献,它既包含文道关系,也包含文统与道统的关系。就文统与道统关系立论,它体现了对人(作者或作家队伍)的要求,要求有道有文,将宋代的文章家与理学家两个队伍合而一之。这是元代特殊时期,以文章为“救世行道之具”在理论上的反映。同时,在更高的哲学层次上,它揭示出文与道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既不可合而为一,也不能离而为二。钟明奇《论李渔文学创作的“人情”说及其思想渊源》,对李渔创作上人情说的内涵先作探讨,指出:李渔之“人情”或者说“人情物理”,并不仅仅是他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一种尺度,同时也成为他从事文学创作之“文心”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此种本乎“人情”的“文心”,其实昭示了他的文学观念与黾勉以求的文学创作审美追求,即:“人情”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善写“人情”,既是李渔传奇文学创作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他文学样式创作的最高艺术境界;在具体的对“人情”“人情”的描写的过程中,李渔十分重视从寻常的“人情

物理”中写出“奇”与“新”；惟有描写了“人情”的“人情物理”，才会有真正的艺术生命力。

文论经典《文心雕龙》，仍是本辑重点。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所朱晓海先生《刘勰心目中的文学宗谱及文学世界》，洋洋洒洒，痛快淋漓地考察了刘勰的文学观念，特别是他心目中道体、经典的神圣文学地位，及其对汉以来至刘宋时期文学世界的否定、针砭，不仅诸子在文学之外，屈原、楚辞更是文学病变症结所在。文章发千年之覆，具穿透力和颠覆力。孙蓉蓉《〈文心雕龙〉的“雕龙”形式论》，从“雕龙”的典故及书名含义入手，讨论《文心雕龙》全书对形式技巧问题的重视、期待，对创作中声律、对偶和用典等语言形式，进行专门的研究，而“雕缚成体”与“自然会妙”两者的相反相成，构成《文心雕龙》形式论的丰富内涵。张莉明《〈史通〉对〈文心雕龙〉宗经史学观的批判》一文，认为刘知幾《史通》在撰述形式和史学思想上收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但刘勰宗经，推崇《尚书》和《春秋》，而刘知幾对《尚书》和《春秋》展开批判，提出隐讳的限度问题，对刘勰的宗经史学观进行批判和修正。王毓红《〈文心雕龙〉用事及其功能意义》，专论《文心雕龙》之用事，阐述了《文心雕龙》的用事原则、八种基本用事方法，并指出：“事类在《文心雕龙》文本中起肯定语言表面和内在含义的功能，并因此达到了增加文本厚度的效果”，对《文心雕龙》批评话语至关重要而不可须臾或缺。刘红色《释“气靡鸿渐”》一文，从“鸿渐”典故的运用和骈文写作规律两个方面，探索《文心雕龙·夸饰》中“气靡鸿渐”一句的确解，并认为这关涉到对刘勰“夸饰”观点的理解。

本辑我们还安排了“史与派”栏目，刊发四篇文章。叶文举《“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事功学派陈亮文学思想研究》，讨论南宋永康事功学派代表陈亮的文学思想，认为陈亮的文学思想渗透了强烈的事功思想的内涵，要求文章有利于政事；反对过度追求文词的外在形式，极为重视文章的“义理”。文章还以《抱膝吟》为中心，讨论了陈亮的文学活动在动机和过程上异于文学家创作的地方。樊庆彦《李贽评选〈坡仙集〉略论》，考述了李贽评选《坡仙集》的目的、体例

及特点,认为王学左派代表人物李贽以“异端”自居,故在选评《坡仙集》中别具只眼,直抒真性情,议论不同于众。而这颇为符合晚明盛行的主情文学思潮,促成了苏文评点的热潮。何荣誉《晚清汉魏六朝诗派诗学的趋向与类型》,论述晚清汉魏六朝诗派的两代代表人物王闿运、章太炎诗学观念的差异及诗歌创作的不同。观念上,王氏重兴,重个人性情的抒发;章氏重风,讲求诗人一己之情与社会的联系;诗学选择上,王氏重六朝宫体、山水诗等绮靡之作,章氏重建安风骨;语言上,王氏重华采,章氏重质实;师古方法上,王氏重拟古,章氏重尊体;创作上,王氏诗风婉而多怨,章氏诗风慷慨悲凉。朱兴和《海日楼诗学渊源及诗学品质管窥》,在前人种种理解、判断、描述的基础上,对沈曾植诗歌博奥难解的特点做了十六个字的概括:古怪斑斓,奥衍沉博,枯涩苍凉,外冷内热,并略加阐释。文章对沈氏为人及诗歌浸淫较深,感悟良多。

本辑中,涂光社先生《说〈庄子〉的“尚大不惑”》,阐述《庄子·逍遥游》及其他各篇的尚大之论及其若干层次,指出“尚大不惑”是为了正确认知,尚“大”也许是不同学派一种共性,但老庄对“大”的推尊胜似其他各家;而更为重要的是,尚大影响了后世的山水诗文绘画等文艺活动:从根本上说“尚大”之大是道之大,是精神境界之大;“尚大”就是尚超越:庄子“尚大”对于文学艺术创造的意义,更在于推崇人生命精神境界的“大”,对士人人生道路的指引,“天地大美”的发现与追求以及从事相关的审美创造是人生命精神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对卑微、琐屑、庸碌、险恶的世俗社会政治的超越,于其中能充分体验和享受智慧生命的愉悦。徐宝余《萧梁尚隐之风与陶渊明的价值发掘》,主要揭示陶渊明的文学价值如何在萧梁时期得以发掘。作者认为陶渊明的价值发掘与萧梁政治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不为学人所知的关联,即萧梁之世的尚隐之风,是建立在激贪厉俗、镇风静俗的风教旨归基础之上,却为陶渊明诗文进入文学视野提供了契机。上至帝王的招隐行为,下至士大夫的希隐之风,加之城旁、宅园等隐逸形式的流行,为陶渊明授受创造了最大可能。陶渊明抒写田园生活的诗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萧梁发掘而出的；也正因为此，萧统对于陶渊明文学价值的评定还存在着其实难副的偏颇。

秋风落叶，岁云暮矣。我们在此谨祝文论界朋友和美康健！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编辑部

二〇一一年十月

目 录

编辑部报告	(1)
-------------	-------

◆ 中国文论的文体论 ◆

隐喻与中国诗	余宝琳 撰 张万民 译(1)
《文镜秘府论》的一些病犯研究	卢盛江(24)
论偈与诗的界限	张 勇(38)
折腰体新探	张培阳(50)
从七古到七律:清前中期的山谷诗接受小史	单重阳(64)
在比较的视域中论明代八股文的哲性基础	张思齐(76)

◆ 文 心 雕 龙 ◆

刘勰心目中的文学宗谱及文学世界	朱晓海(104)
《文心雕龙》的“雕龙”形式论	孙蓉蓉(135)
《史通》对《文心雕龙》宗经史学观的批评	张莉明(154)
《文心雕龙》用事及其功能意义	王毓红(164)
释“气靡鸿渐”	刘红色(189)

◆ 经 与 思 ◆

《五经正义》诗学思想简论	刘 顺(196)
苏轼易学中的“和而不同”与其文艺思想	程 刚(205)
论元人文论的“文与道一”说	查洪德(217)
论李渔文学创作的“人情”说及其思想渊源	钟明奇(249)

◆ 史 与 派 ◆

“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事功学派

- 陈亮文学思想研究 叶文举(266)
- 李贽评选《坡仙集》略论 樊庆彦(279)
- 晚清汉魏六朝诗派诗学的趋向与类型 何荣誉(295)
- 海日楼诗学渊源及诗学品质管窥 朱兴和(315)

◆ 其 他 ◆

- 说《庄子》的“尚大不惑” 涂光社(324)
-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新探 唐志远(340)
- 萧梁尚隐之风与陶渊明的价值发掘 徐宝余(353)
- 唐宋文人对“秋风鲈鱼”意象的审美演绎——兼论
中国文化意象之审美再生产 侯 艳(371)

◆ 文 献 ◆

《百家诗话抄》溯源小考(附:李钰抄

- 《随园诗话》逐条钩识录) 童 岭(392)
- 樵庵诗话(二) 陆宝树 撰 杨 焘 整理(405)

隐喻与中国诗^①

(美国)余宝琳 撰 张万民 张楣楣 译

任何熟悉文学的人都知道,西方关于隐喻的概念一点都不清晰,因为对于“隐喻的相关术语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特性与定义,一直争论不休”。^②当隐喻被用来解释中国诗歌,情况就更混乱了。诚然,大部分批评家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诗歌中存在着与西方的

① 本文原题 *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 发表于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 2 (Jul. 1981), 第 205—224 页。作者余宝琳(Pauline Yu), 自 2003 年 7 月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学会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会长, 该理事会旨在支持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资助项目包括个人研究经费、会议补助以及国际学术交流。余教授从 1994 年至 2003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文理学院的人文学部主任以及东亚语言文化教授, 她先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与文学学士学位、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她曾出版和发表大量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比较文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著作, 曾获得美国的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美国学会理事会、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等机构的奖金, 并因入选 2007 年度 PMLA(《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最佳论文而获得 William Riley Parker 奖金。余教授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会员, 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和美国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的正选委员。她还是美国国家人文科学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柏林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Berlin)以及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理事, 国会图书馆学者委员会(Scholars Counci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的成员。此外, 她还是提格基金会(Teagle Foundation)和蒋经国基金会国际学术交流理事会的理事。余教授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化兼职高级研究员和访问教授。译文承余教授过目及指正, 特致谢意。

② Alex Preminger, et al.,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enlarge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490.

隐喻相对应的修辞手法。但是仔细研究中国诗学之后,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歧异。这些歧异,与其说在于修辞手法本身,不如说在于修辞背后的写作传统和世界观、以及诗学的一些根本预设。

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李贺(791—817)的诗。这位中唐诗人的作品,一直都因其奇特的幻想、怪异的意象,以及与西方诗歌的相似,而被认为与众不同。乍看之下,他的《梦天》确实有几处很像隐喻: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①

在前四句中,看起来有许多隐喻的指代。开头一句用了兔子和蟾蜍的意象,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它们都居住在月亮上,因此被用来指代月亮,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它们的眼泪形成了夜色。第二句的“云楼”和第四句的“鸾佩”都是提喻,指代住处与人,但究竟是何处与何人,诗中则并未明言。此外,在第三行中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玉轮”轧碎了露水。

然而,细读之后,我们发现李贺诗中的所指并非如开始所想的那么晦涩。尽管诗人没有直接提及“月亮”,但他凭借大家熟知的传统手法指明了这首诗的主题就是月亮。第一句如此,接下来的三句也是如此。“云楼”也许是地球上的某座宫殿,但更可能是指嫦娥的居所,传说中嫦娥偷走丈夫的不死药后,飞上月宫,从此过着清冷孤寂的生活。桂树一直被认为是月中的植物,第四句中的“鸾佩”也属于同一场景,它们装饰着月中神仙的马车和手腕。“玉轮”也不是李贺的个人创造,它是一个传统的比喻复合辞(kenning),一个复合的、浓

^① 《全唐诗》(台北:明伦出版社重印,1971年),第4396页。

缩的隐喻和转喻(玉的颜色是联想的关键因素)^①,因此不是一个单纯的指代。并且,李贺把月亮描述成一个在夜行的轨道上轧露的玉轮,也只是重新诠释了它那如水的光泽,这一特点早已在第一句的老兔寒蟾泣泪中得到体现。

尽管这些意象指涉了自身之外的事物,但这些指涉物并不是绝对的“他者”,它们只是文化传统或所指事物的一部分。无生命之物和有生命之物都用现实世界的词语来描绘,事实上,它们被认为属于同一个世界——即使相距很远。想象在这里并不依靠时间的或推演的方式。开头的四句诗重复了对月亮的指涉,因而读到第四句时,我们并没有得到比第一句更多的信息。这四句只是简单地排列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绘,是两个角度之间的转换。诗的第二部分,在每个对仗中都以同样的方式重述了人类时空的渺小——从月亮观察地球的渺小:“三山”指传说中东海的三座岛屿(蓬莱、方丈和瀛洲),它们被认为是神仙的居所,而“齐洲”则指中国。批评家常常谈论李贺诗歌意象的奇诡和特异,李贺自己也把这首诗解释为一个梦,然而我认为,这首诗的思考方式和结构,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诗歌中那些所谓的隐喻。

德里达认为,“任何关于隐喻的话语,都有一个密码、一个程式或一种修辞:首先,我们习惯上都会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至少是《诗学》中的定义。”^②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非常简单易懂:“隐喻就是借用原

① Martin Joos 在给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与 Morris Halle 合著的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一书所写的书评中指出,比喻复合辞(kenning)“起码是一种比喻,它非常独特地将隐喻和转喻结合在一个完美的浓缩表达中”,因此它是雅各布逊的隐喻和转喻两极区分的一个反例,书评见 *Language* 33.3 (1957): 410。雅各布逊说:“(日常或文学)话语的发展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即一个主题可以通过相似或者相邻的关系引发另一个主题。因为这两种情形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所以‘隐喻方式’是第一种情形最恰当的称谓,‘转喻方式’则是第二种情形最恰当的称谓。”(*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56], p. 76)

② Jacques Derrida, “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 Philosophy,” trans. F. C. T. Moore, *New Literary History* 6.1 (Autumn, 1974): 30.

本属于别的事物的名称；这种名称的转移可以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以类似为基础。”^①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列举了名称转移的例子（1406b, p. 173），其中第四种——类似——最复杂，因为它牵涉四种事物间的两种关系（如果 A:B:C:D, 那么 D 可以指代 B, 或者相反[1408b, p. 187]）。用《诗学》中的话来说，隐喻就是“诗”的语言，是一种偏离日常语言从而避免散文化的方法（1458b, p. 253）。

然而，亚里士多德又认为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移或替代。这一设想，隐含在他对复杂类比的偏好中。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认知模式，它在给无名者命名时，传递了“新”的知识，让我们学习（《修辞学》1410b, p. 186）。隐喻的创造者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观察和思考，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十分称赞这种方式的意义，他说：“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就是创造隐喻，这种本领不能从别人那里学来，它是天才的象征，因为一个好的隐喻暗示着一种直觉感知力，从不同中找出相同的感知力”（1459a, p. 255）。这种能力，就是在看似无关的事物中寻找联系，将无名的事物想象成其他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也许是讨论隐喻的第一人，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几个世纪以来，对隐喻的讨论层出不穷；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新文学史》（6.1 [Autumn 1974]）和《批评探究》（5.1 [Autumn 1978]）上都有讨论隐喻的特刊。然而，亚里士多德还是为讨论隐喻的两种最基本模式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卡勒（Jonathan Culler）在《新文学史》中所说的哲学的模式和修辞的模式：

前者把隐喻置于理性与指称之间，即把一物看作某物的思维过程；后者把隐喻置于两个意义之间，即字面意义和隐射意义。所以，前者把隐喻当作是所有语言的普遍特质，以各种委婉的语言技巧隐射另一个世界；后者把隐喻当作

① Aristotle, *Poetics*, trans. Ingram Bywater (with the *Rhetoric*, trans. W. Rhys Robert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4), 1457b, p. 251. 以下随文标注页码。